

目 次

作家评论

龚自珍与雪莱(一至三)

余光中 一

古典文论

刘勰的原道观

郑毓瑜 四一

以意逆志、诗之纲也

周浩治 五一

诗、书、画三绝

方 闻著 林柏亭译 七〇

座谈会

晚清小说座谈会

罗 禾记录 八九

香港文学概况

香港的文学面貌

李英豪 一〇六

香港代有文学出——略谈香港文艺拓荒

金 依 一〇九

补 白

《红楼梦新补》出版前后

许第高 五〇



雪萊畫像

龔自珍與雪萊 (一)

本文長約五萬字，共分五篇，依次為第一篇「鑒粟」，第二篇「聲名」，第三篇「童心」，第四篇「俠骨」，第五篇「柔腸」。文中所引英文詩句、文章、書信等等，均由本文作者自譯。至於所引中文，為免冗長及繁瑣，僅擇要附註出處。龔自珍與雪萊生於同年同月（一七九二年陽曆八月），我寫此文，正值中英兩大詩人誕生一百九十二週年。謹拋此文以引珠玉，並望高陽先生能用定庵一生故事寫一部歷史小說，以慰天下之有定庵癖者。棄子先生遺作古人，此文不能及時就正，令人悵悵。不知八年之後，我國文學界能舉辦「龔自珍、雪萊二百週年紀念會」否？

一九八四年八月歲於沙田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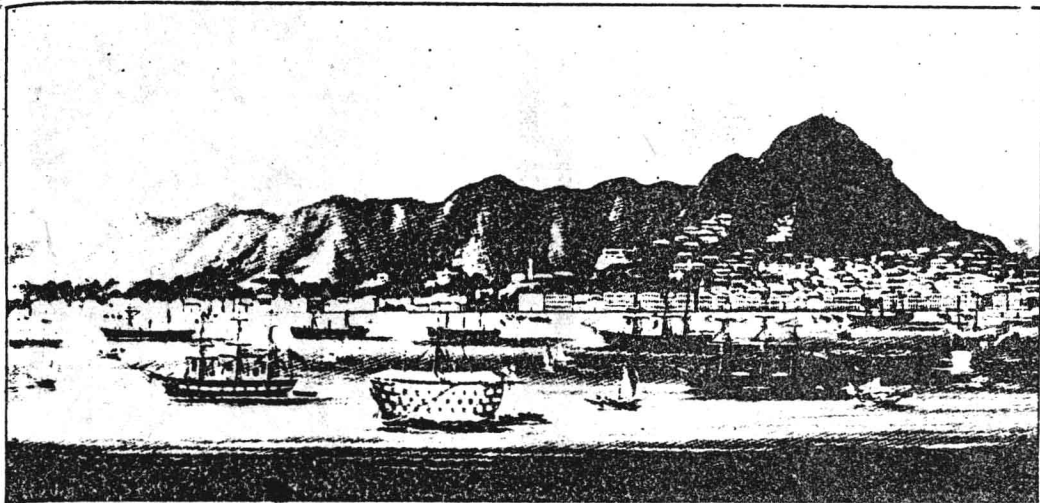
罌粟篇

近日港人聚談，無不前瞻九七，卻少回顧四二。但是沒有一八四二，也就不會有一九九七。而一提到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自然會聯想到未捷的英雄林則徐。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十一月，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分來廣東查禁鴉片，他的宣南詩社文友龔自珍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裡，提出了禁煙、抗英，與保密的建議。次年六月，英國為了林則徐銷毀鴉片兩萬多箱而要動武，龔又向林提出禦敵之策，卻因故未能投寄。他在「已亥雜詩」中慨嘆此事說：「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戢勦。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前兩句是說，林則徐出任欽差大臣，禁煙尚未成功；後兩句是說，我有應敵的用兵之策，可惜這密件寄不到他的手裡。龔自珍，是鴉片戰爭前夕最激昂慷慨的詩人，可惜不久他竟因暴病去世：那年正是一八四一。詩人死於八月十二，其時鴉片戰爭正當劇烈。

依中國算法，龔自珍死於五十歲，他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同一年另一位大詩人生於英國，就是雪萊。雪萊生於陽曆八月四日，自珍生於陰曆七月初五，據說與鄭玄同日；合該年陽曆八月廿二日。所以依西曆計，雪萊與自珍生於同年同月，雪萊只早生十八天。

直到十九世紀末年，熟悉印度的英國詩人吉普林還說：「東是東，西是西，東西終古不相期。」①自珍和雪萊雖然生於同年同月，卻一東一西，互不相聞，更不可能互相影響。但是間接的關係未必沒有。那關係，正是鴉片。

先說龔自珍這一邊。中英之間的貿易，在十八世紀末期中國還是出超，輸入英國的主要是芬芳而有益的茶葉；到了十九世紀初年，正是自珍二十歲以後，中國已轉為入超，東印度公司從印度直接或間接輸入中國的，主要是芬芳而有毒的鴉片。其結果是人民的身體受害，國家的白銀外流，中國蒙受了雙重的損失。一時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僧尼兵弁，普遍吸食鴉片，氣得林則徐說是「謀財害命」。一直二十世紀後期，英國還有所謂史學家為他販毒的祖先洗刷，說什麼「當時英國人並未向心有不甘的中國政府強售鴉片，也未存心要害顧客……在普通人看來，這種習慣並不為害社會，所以（中國的）輿論也不肯加以指責。」②這簡直是公



然說謊，不下於日本教課書把「侵略」淡化為「進出」。且看龔自珍怎麼說的：

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剕脰誅。兵丁食宜剕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③。

自珍對鴉片為害之深，痛心疾首。在同一文中，他再三要林則徐厲行禁煙，對於企圖來阻撓的儒生、關吏、書生等等不假詞色。他說：

送難者，皆天下點猾游說而貌為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為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

這是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底的事。到第二年，自珍又在「己亥雜詩」裡諷刺當時的幕僚吸食鴉片：

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
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櫺護阿芙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癡。
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此時鴉片戰爭尚未開始，但中英之間的情形已日趨惡化。第三年六月，英軍佔定海，為期兩年的鴉片戰爭即告開端。當年十一月，自珍在「與人箋」中已經表示絕望：

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脣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輩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尚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

英國在孟加拉、孟買
連山栽種罌粟
以厚其毒，林則徐檄諭
維多利亞女皇。

英國人所營的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是在一七七三年，從此便獎勵栽種，統制運銷。一七九六年，中國禁賣鴉片，東印度公司不再自運，轉委之於所謂港腳商人，進口有增無減。到了雪萊逝世之年（一八三二），鴉片人口每年平均九千餘箱。到林則徐南下禁煙之年，已經增至近四萬箱：鴉片貿易已佔英國對華輸出總額一半以上，印度政府歲入的十分之一賴此④。林則徐為此兩擬諭英王檄，希望



訴諸維多利亞女皇的良知，而約束英人，使其不再種鴉片於印度，銷鴉片於中國。林則徐說：

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為害外國否？況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斬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為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斬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鹹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向聞貴國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貴國王所都之蘭頓（London）及斯葛蘭（Scotland）愛倫（Ireland）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如孟阿拉（Bengal）、曼達拉薩（Madras）、孟買

（Bombay）數處，連山栽種，開地製造，累月經年，以厚其毒，臭穢上達，天怒神恫。貴國王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有敢再種鴉片者，重治其罪，此真與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祐而神所福，延年壽，長子孫，必在此舉矣⑤。

在修正的徵論稿中，林則徐又對女皇說：

今與貴國王約，將此害人之鴉片永遠斷絕：我內地禁人吸食，貴國亦禁人製造。其從前已經製造者，貴國王須即令其搜盡，投之海底，斷不許天地間有此種毒物……即貴國人民，既有造作，安知其不吸食？並令造作而禁之，則貴國亦不受其害，豈不各享太平之福⑥？

林則徐理直氣壯，但是英國人為了商業的利益，聽不進去。早在一八三〇年，英國下議院的機密委員會在報告書中就指出：「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具有鴉片專賣權，放棄如此重要之稅收來源，似乎不智。」⑦一八三八年五月，就在林則徐任欽差大臣之前半年，老謀深算的威靈頓公爵宣稱，對於運銷鴉片一事，國會非但無意反對，而且加以保護，推廣，促進⑧。英國人能在國內做紳士，是由於他們同時在海外做盜賊。東印度公司大概是有史以來最龐大

的販毒集團了。西方列強絕對想不到，一百年後，就輪到他們自己的子孫沉溺於吸毒吧。而其實，就在英國以鴉片謀利的當年，就在浪漫主義的高潮，英國人自己也不見得能全然免於阿芙蓉之劫。

德昆西、柯立基、拜倫、雪萊……等英國文學大家，亦染毒成癮，深陷沈淪之苦。

散文大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69）從十九歲起，就因為腹部風溼的神經痛，依從醫生的處方，開始服用鴉片酊。後來病痛惡化，不但藥量加重，服用也更頻，兼以窮愁潦倒，以此自遣，乃染上阿芙蓉癖。從三十二歲起，終德昆西一生，都未能戒絕毒習。時人病其耽毒，德昆西則以無鴉片刺激就不能動筆自辯。連欣賞他文筆的波德萊爾，也不以為然。德昆西在深陷毒癮時嘗盡沉淪之苦，而要減量戒時更為難受，可是他的名著「一個英國食鴉片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正得自這種苦楚引發的惡魔怪夢。且看書中的一段自述：

我似乎夜夜都陷進深穴和暗無天日的黑坑，一層低於一層，似乎永無希望回升……然



澳門月報三論

鴉片製造一在八達罕一在默罕。皆在阿拉伯地方。而孟阿拉各官設法加工總要引中國人嗜好此物在加爾吉達孟部稅務上即可查出每年鴉片到中國多少。到別處多少無不列明。近來六年間孟阿拉出產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箱。內有六萬七千零三十三箱到中國。故鴉片乃是中國最銷流之物。今將其數目開列於下：一千八百三十三年，道光十三年，中國七千五百九十八箱。各處一千八百一十箱。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國一萬二千二百零

後忽起驚擾，來回急竄，無數亡命之徒惶惶而逃……然後，在深感一切都已沉淪之餘，出現了女體；那種面容使我覺得願意為它犧牲一切；可是只得片刻時機——兩手緊握，傷心離別，然後呢——就永訣了！

這暗無天日的深淵，令人聯想到詩人柯立基(S. T. Coleridge, 1772-1834)的名詩「忽必烈汗」(Kubla Khan)中相近的夢境，因為詩裡也有深洞、巨隙，還有兩個女人。柯立基在該詩的小引中說明夢境的由來：

一七九七年夏天，作者因身體不適，隱居於波洛克與林登之間的一座僻遠農舍，其地在沙、德兩郡的艾克思漠荒原。因感微恙，遵醫囑服用止痛藥，藥力所及，倚椅沉沉入睡，時正展讀「伯佳司遊記」，有句略如下文：「忽必烈詔命在此建宮，宏其園囿。於是沃野十里，盡入宮牆。」作者熟睡歷三句鐘，至少外在感覺如此；夢中栩栩然，自信賦詩不下二三百行；當時意象紛呈目前，均為實物，符合之詞句亦相應而生，略無力求之感，不知如此果為作詩否。既覺，夢中諸象似仍歷歷可憶，逕取筆墨紙張，手快意飽，錄寫成句如下。

可惜才錄得五十四行，有客來訪，歷一時許始

去。詩人回室欲續其篇，竟已記憶淡遠，難以為繼了。其實，小引中所謂的「止痛藥」，正是鴉片，份量雖輕，引發幻覺的藥力卻不弱⑨。不過柯立基服食鴉片，往往苦多於樂，不是每回都能收穫到這種奇妙詩。柯立基一生苦於病痛，劇烈的時候會「倒地扭掙如蟲」。當時的治療成規，就是叫病人服鴉片止痛。柯立基在二十八歲時就因風溼服食過量，習之成癮，卻驚覺毒癮之苦尤勝於原來的病痛。三十歲時所作的「落魄吟」(Djection: An Ode)，正是婉健康、幸福、詩興之消逝。他去世地上海上的馬爾他島住了兩年，企求康復，但重回英國時仍深陷毒癖而不能拔，悔恨交侵，常自絕望內咎的惡夢中嘶叫醒來。

鴉片在醫藥上既有止痛及安眠的治標功效，十九世紀時它在英國也就成了慣用的靜鎮劑或麻醉劑。濟慈做過外科醫生的學徒，後來更取得藥劑師的資格，對於鴉片的作用當然明白。他在詩中幾度提到鴉片催眠之功，不為無因⑩。拜倫也曾服用。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可以舉出詩人羅賽蒂的妻子服鴉片逾量而夭亡的例子。雪萊多愁善感，短短的一生屢遭挫折，很容易託庇於阿芙蓉的闡遼之鄉。根據他的好友詩人兼小說家皮考克(Thomas Love Peacock, 1785-1859)的追述，他與前妻海麗雅疏遠而愛上(不久成為後妻的)瑪麗之際，「眼睛充血，頭髮和衣服都零亂不整。他抓起一瓶鴉



片酏，說道：『我離不了這東西。』^①法國作家莫洛瓦在他的雪萊傳裡，也說在此之前雪萊已服過鴉片，只是此時份量加重^②。就在此時，雪萊有一天衝進瑪麗家，把一瓶鴉片酏塞在瑪麗手中，說她服後，即可解脫家庭的壓迫。更可驚的，是雪萊並不以鴉片的止痛功效為滿足。他在溺海而死之前一個多月，寫了一封信給崔羅尼，提出如下的請求：

懂醫藥的人會調製氫氰酸，也就是苦杏仁精 (Prussic Acid, or essential oil of bitter almonds)，如果你遇見這種人，為我購得少許，我當十分感激。調製這東西要十分仔細，務必求其精純；再高的價錢我也肯出；你該記得那天晚上我們談到這件事，你我都表示有意購備；我是真的有意，為了解除不必要的受苦。我無需向你說明，目前我不準備自殺，可是我得坦承，手頭握有開啟長眠之室的金鑰匙，對我總是快慰的事。氫氰酸用於醫療時，份量極其輕微，藥劑力弱，純度不足以盡除百痛。只要一滴，甚或不足一滴，已成一劑，藥力一發，就令人麻痺。(13)

皮考克對這封信的按語是：「我相信，一直到現在，雪萊每次旅行，一定帶手槍自衛，並帶鴉片酏以解劇痛。他身多病痛，常發而且不

輕；他寫這封信，是恐怕一旦病重不治，難以忍受時，能經常自備解痛之方。」^④

雪萊雖然服鴉片，對於印度卻所知不多，對於東印度公司種鴉片的事，更似乎一無所知。其實他週圍的朋友之中，有許多位都久居印度，甚至為東印度公司工作。前述的崔羅尼就在印度長大，見聞過人，曾笑稱偷遊踪不出地中海岸。雪萊在意大利經常往還的三個人，是他的表兄梅德文，他的伊頓校友威廉姆斯，和威廉姆斯太太簡茵。當時，這三個人也都是剛由印度回到歐洲。威廉姆斯先投效海軍，後來轉入陸軍，派去印度第八騎兵防衛隊。這時回歐，他和梅德文都以中尉官階退役，仍領半薪。按一八五八年以前駐防印度的英軍，實際上是守衛東印度公司的領地與廠房，分駐孟加拉、孟買、馬德刺斯三區，等於東印度公司的傭兵。我相信，威廉姆斯等人對於自己公司鴉片輪華的大宗貿易，理應知悉，甚至也許對雪萊講過。至於雪萊早年的文友皮考克，早在一八一九年也就是雪萊歿前三年，已經任職於東印度公司；後來地位日趨重要，更於一八三六年至一八五六年間擔任公司的通訊總監。

源源白銀換來有毒的黑土，龔自珍憂國如焚。



雪萊對印度所知既少，對中國當更隔膜。他的文化所寄，理想所託，全在希臘。在詩劇「希臘」(Hellas)的序言裡他說：「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文學、宗教、藝術都植根於希臘。如果沒有希臘，則啟發、征服、領導我們祖先的羅馬，武力所及，也就無以傳播文明，而我們也許都尚未開化，仍在崇拜偶像；也許早就像中國和日本一樣，社會制度已陷於僵化可悲之境了，那就更加不堪。」

雪萊在讚美希臘之餘，對於中國的了解顯然不足，評價也低。雪萊在寫「希臘」時（一八二一），誠然英國國勢日盛，而中國日衰，但中國處境之所以「可悲」，與東印度公司的鴉片生意頗有關係。中西的正常貿易，本來中國出超，但到了雪萊在世的最後十年，很快就轉為入超了，關係全在鴉片。其結果是白銀外流，換來有毒的黑土。雪萊和拜倫臨終前念念不忘的，是歐洲文化的聖地希臘猶在土耳其人的高壓統治之下，有待解放。其實當時中國被役於滿清，處境亦復相近。

由於地理阻隔，文化迥異，雪萊的世界觀當然不免有蔽^⑮。襲自珍這一邊呢，對於英國也所知有限。自珍降世後一個多月，英國才正式遣派馬戛爾尼出使來中國；翌年他在熱河覲見乾隆，還為了不甘磕頭引起糾紛。馬戛爾尼之來，是為了洽談兩國商務，清廷卻認為是來進貢。在當時公文的漢譯裡，Great Britain有

時是「英吉利國大紅毛」，有時卻成了「牙蘭地密屯」，而喬治三世則為「熱沃爾日第三」^⑯。

襲自珍在當日的讀書人裡，危機意識最高，不但關心天下大事，而且注意海陸邊防，尤其致力於蒙古及新疆的地理。他最聞名的兩篇論邊務的文章，是「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船議」。後面的一篇不幸佚失，大意是憂帝國主義對沿海各地的經濟侵略，會用鴉片及奢侈貨品換去白銀。前面的一篇建議把華北及江北的人移徙西北，去開發守邊；其中經濟及國防的卓越先見，後來大半得以實施，極受李鴻章的推崇。

此外襲定庵論述西北邊情的文章還有很多，例如「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一文中，論回教與耶穌教之異，就十分有趣。自珍的學問博而雜，在當時固然遠非時輩所及，但是他的世界觀，拿來應付西方列強的處心積慮，仍嫌不足。在「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裡，他把鄂羅斯逕稱為北方屬國，便不適當。至於「東南罷番船議」要拒所謂夷船於港外，所見也未免消極而狹隘，張維屏即已指出^⑰。自珍有一首七絕說：

九邊爛熟等雕蟲，遠志真看小草同。
枉說健兒身手在，青灯夜雪阻山東。

詩很慷慨沉鬱。九邊，原指從遼東到甘肅的九個邊防重鎮。九邊爛熟，就是深諳邊情的意思。但是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海波上已滿是各色旗旗的番舶；華夏，不再僅僅是一個亞洲古國了。龔自珍對「西夷」實在並無多少認識^⑮。直到他逝世那年，在英艦耀武揚威的炮聲中，才有汪文泰所撰的「紅毛番，咭喇考略」等文問世。第二年，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四個多月，魏源在林則徐發下所撰的「海國圖誌」才刊於揚州，而在台灣道任內退過英軍的姚瑩，才撰出較具規模的「英吉利國誌」。龔自珍，正如他自己的詩句所說，真是「但開風氣不為師」了。

※第一篇附註

- ① Rudyard Kipling, "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 ② John Bowle, "The Imperial Achievement" (Pelican, 1974) p.343. 引文後半乃轉引自 C. P. Fitzgerald, "China,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1954) p.565.
- ③ 見龔自珍「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 ④ 見「近代中國史綱」郭廷以（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頁五一。
- ⑤ 見「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卷三。

- ⑥ 見李圭「鴉片事略」卷上，頁四一至四三。
- ⑦ Immanuel C. 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1970) p.219.
- ⑧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1964) p.48.

⑨ 柯立基在「忽必烈汗」手稿上自註說，此詩寫於一七九七年秋天，當時因患痢疾，乃服了兩囀鴉片（two grains of opium）。按一囀為一磅之十千分之一。

⑩ 見濟慈名詩「夜鶯曲」及十四行詩「致睡眠」（"To Sleep"）。

⑪ "The Life of Shelley" (J. M. Dent & Sons, 1933) Vol. II, p.336. 皮考克原書名為 "Peacock's Memoirs of Shelley". 所謂「鴉片酩」（laudanum）乃鴉片之溶於酒者。

⑫ André Maurois, "Ariel, the Life of Shelley" (Frederick Ungar, 1924) p.155. 同書一〇九頁記述瑪麗的異母姐姐芬妮（Fanny Imlay）因暗戀雪萊，絕望自殺，所宿旅舍的桌上留下一瓶鴉片酩。凡此皆可旁證，在龔自珍的時代，鴉片在英國為害之大，雖不若其在中國，卻也及於不少文藝青年。

⑬ Shelley's Letter to E. J. Trelawny on June 18, 1822. See "The Life of

Shelley" (J. M. Dent & Sons, 1933) Vol. II, p.209.

⑭ Ibid. II, 336.

⑮ 「希臘」的倒數第二段尚有這麼四行：

Saturn and Love their Long repose
Shall Burst, more bright and good
Than all who fell, than One who rose,
Than many unsubdued.

雪萊自註說："All those who fell, or the Gods of Greece, Asia, and Egypt; 'than One who rose,' or Jesus Christ, at whose appearance the idols of the Pagan World were amerced of their worship; and 'the many unsubdued' (未馴之多數) or the monstrous objects of the idolatry of China, India, the Antarctic islands, and the native tribes of America……由此可見雪萊是把中國當做「蠻族」看待的。

⑯ 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頁二二四。

⑰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五云："定庵為文，動輒數千言，姑即一篇論之。其文曰『東南離番舶議』。試思番舶之來，數百年矣，近年其來愈速，其風愈橫，誰能罷之？是斷不能行之事，而定庵乃以為得意之文，

則謬矣。」

⑮龔自珍自負頗高，而對當時常州的人才卻十分推崇，甚至注意到常州的數學家。他的長詩「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裡，有句云「近今算學乃大盛，秦西客到攻如仇」。第二句是說對於西方輸入的數學也拚命研究，勢如攻敵。

2 聲名篇

蘇曼殊曾以拜倫比李白的仙才，以雪萊比李賀的鬼才。這比擬當然不妥，難怪見譏於錢鍾書。近人論中西文學，無論是否循比較文學的正規，常喜同類相比：例如以華滋華斯比陶潛。這樣的類比海闊天空，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華滋華斯比陶潛晚了一千四百年，時代不同，環境迥異：陶潛的時代沒有工業革命與法國革命。我在類比之外，有意加上時代相同的條件，試看中西兩位詩人，至少在一個相同的條件之下，其作品呈現了怎樣的異同；而這些異同，除了取決於個別的才情氣質以外，有多少能追溯到各自的文化傳統。

龔自珍生於書香仕宦之家：祖父龔敬身官至

雲南迤南兵備道，著有「桂隱士房遺稿」；父龔麗正官至蘇松太兵備道，著有「國語補注」；母親段馴是女詩人，著有「綠華吟榭詩草」，定庵小時習誦吳梅村詩，即由其母口授。但對他影響最大的，是外祖父古文家段玉裁，不但在他十二歲時授他許氏說文部目，而且賜字曰「愛吾」①，並把孫女嫁給他。

雪萊的先人是英國南部塞西克斯郡的貴族，卻無書香氣息。他的祖父畢希（Bysshe Sheile）先後娶了兩個富家女，成為霍山的首富。他的父親也娶了郡裡的名門閨秀，捐得了從男爵位。雪萊是長子，也是爵位的繼承人。他的父親對他並不嚴峻，反而處處盡量遷就，有時近於縱容。他的母親據說儀容華貴，為人寬厚，寫的信頗有文理，但是對他的影響不大②。顯然，雪萊的家庭雖然提供他當日最好的教育，伊頓與牛津，和一生經濟的支持，可足對他之為詩人卻無多大關係。

雪萊天真純情，又耽於理想，昧於世故，有心無意之間，往往誤己誤人，一生充滿悲劇。在生活上，先是因言論不經被牛津大學開除，繼而因行為不軌被擯於英國的社會；前妻溺死河中，少女芬妮為他自殺；前妻所出的兩個孩子，法院因為他是無神論者，判他不得撫養，而後妻所出的長子長女不出一年相繼夭亡。在文壇上，他一生沒沒無聞，讀者寥寥，知音渺

渺，只有像李衡（Leigh Hunt, 1784—1869）這樣的批評家給他鼓勵。週圍的朋友真能欣賞他天才的，屈指可數，而且多為女性。濟慈對他的詩也不盡滿意，曾在信中勸他「收斂起高貴的情懷，儘量做一個藝術家，而且把你詩題的『每一處石隙都填滿』金砂。」③雪萊末年與拜倫交往最密。當時拜倫早已名滿天下，崔羅尼問他為何不在詩中為雪萊美言幾句。拜倫卻說譽之無益，「只要他把自己感人的玄學之殼蛻去，又何需他人來吹噓」，始終不肯在筆下讀他一句④。

雪萊之志在做詩人，卻不汲汲於早揚浮名。他和唯美的濟慈不同：他寫詩，是為了把自己革命的思想播於天下，去喚醒世人。所以他要西風把他吹成一座豎風琴，又要向雲雀學習唱歌，讓舉世仰聽。龔自珍的情形恰恰相反：他雖然失意於科場與仕途，詩文在生前卻早享盛譽，與魏源並稱。這一點他頗有自知，也相當自豪，曾在詩中自稱「少年尊隱有高文」，又說「少作精嚴故不磨」。「己亥雜詩」一七八首說得更妙：

兒談梵夾婢談兵，消息都防父老驚。

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

詩末還自註說：「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

都留別詩者，時有『詩先人到』之謠。」也可見作者如何得意了。「兒談梵夾婢談兵」，足見做父親和主人的如何學貫儒釋、才兼文武，這氣派，比起雪萊和拜倫的比薩雅集（the Pisan Circle）來，又是一番風味了。

龔自珍科舉失意，
志不得酬，「名臣」做不成，
只落得「名士」一途。

定庵的失意在科舉不能脫穎而出，三十八歲參加朝考，作「安邊綏遠疏」，閱卷諸公皆驚其才，卻因措法不中程，不列優等。他憔悴京華，官不過內閣中書、禮部主事，正如他詩中所嘆的：「蒼茫六合此微官」。他做官的目的原在澄清天下。在「上大學士書」中他這麼說：「……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言之。」^⑤因此他雖做不了官，不能力行救世，也要退求其次，力言警世。胸中有這許多感慨激奮，寫詩自然言之有物，下筆有情。

定庵經世致用，志不得酬，卻贏得許多知音，失意之中並不寂寞。外祖父段玉裁早在他的弱冠時就誇獎他的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又讀他的詞「銀怨盛雪，明月感

鸞，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⑥這當然是愛孫心切，未免有點溢美，但是對外孫的正面鼓舞，可以想見。女詞人歸佩珊甚且稱譽定庵與他的續絃夫人何吉雲為「國士無雙，名姝絕世」。定庵既歿，好友魏源為他編就「定庵文錄」，說他「文字交與洞關，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網之深淵，絨以鐵石，土花繡蝕，千百載後，發鏽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他歿後廿七年，曹錕為他的文集題辭，也說「定庵往矣。定庵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真不忘夫定庵者，亦其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⑦

定庵的詩鬱怒清深，風流儒雅之中激盪著一股勃然不磨的豪氣俠情，令人對卷低迴。從當代的蔣子瀟到清末倡詩界革命的黃遵憲、康有為、譚嗣同，以迄易實甫、蘇曼殊、柳亞子等南社作者，莫不多少受他的感染。譚嗣同把他和汪中、魏源、王闓運並舉，說：「千年暗室任喧騰，汪魏龔王始是才。」柳亞子更讀他「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物極必反，名滿謗隨。朱一新在文中，張之洞在詩中，都罵過定庵。與公羊學派對立的古文學家章太炎斥龔文為「側媚」、「佻達」。王國維評他

的七絕「偶賦凌雲偶倦飛」，說他「價薄無行，躍然紙墨間。」熊十力也貶他說：「清人如龔自珍輩，亦稍能見及當時社會情形。然自珍本浮華名士，雖不無聰明，而學甚膚淺，以荒淫自了，絕無立己之道，無與民同患之誠。」梁啟超尤其自崇拜轉為幻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久乃厭其淺薄。」在同書中梁氏又說：「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直至末葉，始有金和、黃遵憲、康有為元氣淋漓，卓然大家。」

這些貶語都有失公平。以思想而言，大凡開風氣的人物，只要能登高一呼而山鳴谷應，甚至退而求其次，只要能一葉報秋，也就夠了。任公筆鋒常帶感情，在民初的新文化運動中，也是啟蒙人物。當日他的讀者也曾「若受電然」，今日回顧，不也有點「淺薄」了嗎？以創作而言，龔自珍的詩篇有經學的淵雅，小學的謹嚴，雜學的恣肆，釋道的瑰麗神奇，加上志士扼腕英雄撫膺的那一股勃然不平之氣，每每感染讀者，有歌哭行吟之概。這種反應最為直接，可謂品詩的一塊試金石。我讀定庵詩，常從苦澀之中味出清甘，近於英文所謂的 bitter-sweet；那苦澀在心境，而清甘在語言，卻在他詩中融成一體。至於某些哲學家不喜歡詩

人，亦多前例：譬如程頤就不滿蘇軾，朱熹對他也有微詞。

在自珍二十二歲那年，段玉裁寫信給他，勉勵他要「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⑧外祖父的期望落了空。自珍憂時傷世，熱中於政治的改革，他治公羊經學，是為經世致用，對於考據並無多大興趣；加以仕途蹭蹬，名臣也做不成。名士，倒是落在他頭上了。自珍文名既噪，狂名亦播，「以不平凡故，乃為細人所點。」^⑨名士而有所謂側豔之詩，把柄當然更多。



雪萊：集「惡魔」之毀與

「天使」之譽；

龔自珍：從南社的「崇

龔」到王國維的「貶龔」。

雪萊遭人指責亦多。社會人士震駭於他的無神論思想和遺棄前妻的敗德行為。當時的批評家認為他詩才頗高，卻運用不當。海斯立特認為他短詩天然出色，長詩便陷入哲學系統而不能自拔；又說他雖有天才，「可惜剛烈不馴的氣質把他的天才驅向歧途」^⑩。其實當日的批評家對他難作蓋棺定論，因為他有不少作品都在死後多年才面世，例如那篇著名的「詩辯」，就到一八四〇年才出版。

批評家對雪萊的評價，百多年來一直分歧，

毀譽之間有天壤之別。在十九世紀，愛倫坡、梅爾維爾、史雲朋、湯普森（Francis Thompson）等都推崇他；而反對派中卻大半是不寫詩的作家，例如海斯立特、卡萊爾、金斯利、馬克吐溫。當時對他的不滿，主要是認為題材不當；至於對他的人格，則初時的憎惡後來漸漸轉為敬重，甚至愛惜。早期的論者視之為惡魔，後期的論者奉之為天使。到十九世紀末，廣大的讀者莫不尊他為偉大的抒情詩人。雪萊聲譽之隆，約略以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〇年為巔峰：當時的兩位文豪，哈代與蕭伯納，真像是雪萊之廟的神茶鬱壘。蕭伯納更坦承自己的宗教觀乃本於雪萊^⑪。

這當然不是文壇的定論。早在一八八一年，安諾德就說：「雪萊其人實際上不很清醒，雪萊其詩也是如此……無論在寫詩或處世上，他都是一個美麗而無用的天使，徒然在虛空裡撲動耀眼的雙翼。」^⑫新人文主義興起後，雪萊的聲譽便一直在下降。莫爾和白璧德發難於先，新批評家如蘭遜、泰特、華倫、布魯克斯等繼起於後，在一片反浪漫主義的浪潮之中，把雪萊評析到狼狽的程度。新人文主義的學者從道德與思想的立場來非議他。新批評的作家則就詩論詩，從詩藝本身來吹毛求疵，認為他一味純情，不可忍受；音調太滑利，不夠沉潛；一喻未完，他喻又起，不夠統一；而又妄想飄忽，憑空來去，不能探索現實。艾略特對雪萊的評

價，仍依十九世紀的慣例，二分結算。他說：「雪萊的詩才誠屬一流，只可惜他死得太早，未能用來表現更可靠的信念。」^⑬李維斯力斥其非，認為雪萊根本詩才不濟，技藝欠精，而且以「西風歌」一段為例，詳加折貶。^⑭自此以後，擁雪派受挫頗重，答辯時往往採取守勢。

自珍與雪萊的身後詩名都曾盛極而淡，雪萊的情況更可說是盛極而衰。擁雪派的大將包陀在一九六〇年甚至絕望地說：「對雪萊的輕視，行將眾口一辭，這情況或許會維持百年，抑將更久。」^⑮龔自珍的情況比較好些。他的地位至南社與新民叢報而極崇，五四以後新詩興起，風氣大變，而誦讀古典詩者尚有李杜蘇黃等唐宋大家可供欣賞，崇龔之風乃漸平息。^⑯不過這只是由盛轉淡，卻不像雪萊屢遭批評名家那麼細析重貶，身後的鬼魂幾乎不得安息。梁啟超、王國維等人貶龔，不過浮光掠影，片言斷案，那像李維斯之輩那麼條分縷析，窮追不捨，致令後人難以翻案？雪萊是浪漫派第二代的健者，自新人文主義以來，浪漫派在文壇與學府之間地位大降，而受創最重的，就是雪萊。至於定庵，在梁啟超之後為他辯護的人不絕如縷。直到四十年前，朱傑勤還肯定他為「文士之代表，思想界之領袖，且為世界大散文家之一」；驚才絕艷，曠代一人。^⑰朱傑勤之論不免有點誇張，他那「龔定庵研究」的專書對定庵詩的評價也前後矛盾^⑱。

雪萊雖屢受詩評，他的成就並未全被抹殺。至今論者仍然承認「普羅米修斯之被釋」為一傑作，「倩綺」(Cenci)為出色的詩劇，「阿當耐斯」為英國有數的輓詩，「西風歌」等短篇為抒情詩的名作，而長文「詩辯」則仍為英國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雪萊在二十世紀之所以跌得重，是因為他在十九世紀的地位太高了。

雪萊詩文並茂，
譯著備受推崇；
龔自珍精通經史、小學、
佛、道……，詩詞均富。

雪萊與龔自珍之間，有一點難以並比。畢竟自珍在世多雪萊十九年^①，閱世更多，創作的時間更長。如果他也像雪萊那麼死於三十歲，則不但寫不出「己亥雜詩」，連道光年間的文章也沒有了。儘管如此，雪萊在英國詩人之中仍可稱博學。他對於柏拉圖和希臘文學造詣頗深。他雖然是牛津大學的除籍生，卻兼通希臘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至於拉丁文，則為當日讀書人必修的歐洲文盲，當然知曉。他曾經譯過柏拉圖的「對話錄」，希臘的荷馬頌詩(Homeric Hymns)，但丁的「煉獄」，柯德隆的「魔術大師」(Calderón: El Magico Prodigioso)，歌德的「浮

士德」；雖然多半只是片斷，卻可見其用功之勤，而後面兩部作品的英譯，據說都極受譯界推崇^②。龔自珍治學更為廣博，舉凡經學、小學、掌故、史地、金石、佛、道，及其他雜學，都供他的詩文驅遣；在文體上，則詩、詞、散文均富。他的詩裡當然提不出像「普羅米修斯之被釋」那樣龐偉之作，即便「能令公少年行」、「漢朝儒生行」等較長之作，也難追「阿當耐斯」之規模。但是他的題材廣泛，感受深刻而獨特，已亥年間南北長途跋涉的八個月裡，竟然成詩三百一十五首，創作力也不多讓了。至於散文，雪萊並無像「說居庸關」、「病梅館記」、「記王隱君」、「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的抒情小品；他的頭腦裡理想充塞，觀念太多，對於在時空世界裡抄襲柏拉圖所謂「理型」(Idea)的實物，並不很感興趣，也不細心觀察。雪萊動筆寫散文，不是為自己的長詩作序，便是要探討抽象而高遠的哲理。在這方面，定庵也不甘寂寞：他那一組「王荅之際胎觀」的九篇文章，從人類起源、制度形成、權力由來，一直說到天道循環，與雪萊學究天人的論文好有一比。不過定庵的散文沉博與衍，矯健縱橫，古樸之中有一股奇氣，特富感性：像「寫神思銘」、「有情」、「尊隱」之類的瑰麗奇文，雪萊的散文裡絕不會有；像「與江子屏牋」那樣老吏斷獄、明快簡練的文章，也不是雪萊所擅長。

故物人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恆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多情誰似汝，未忍託懷孤。

定庵的這首五律「賦憂患」至少有三個特點。第一，主題抽象，這在西洋詩中常見，在中國詩中罕聞。第二，抽象事物擬人化，而且當面稱呼，幾若西方修辭之apostrophe。第三，憂患看上了詩人，寸步不離，詩人竟習以為常，日久情生，捨不得分手了。這真是以苦笑代替痛哭，可謂一反常情的翻案文章。鄧約翰也未必能寫得這麼匪夷所思；至於雪萊，抒情向來露骨，而且耽於自艾自怨，如果由他來寫，大概第一、第二兩點駕輕就熟，第三點的溫柔敦厚與曠達自嘲，就辦不到了。

雪萊在十九世紀初的詩壇固然是一大英才，但那是群星爭輝的時代，至少有五位大詩人與他同時。龔自珍的前輩袁枚、蔣士銓、趙翼三人之中，只有耄翁趙翼在他廿三歲時還在世，袁、蔣都不相接。黃景仁在他生前九年已歿，黃遵憲在他歿後七年才生。在嘉道之間寂寞的天空，他幾乎是孤光獨照，當真是他名詩「秋心」裡所說的「長天一月」了。

※第一篇附註

①見段玉裁「經韻樓集」外孫襲自珍字說：

「余曰，字以表德。古名與字必相應，名曰自珍，則字曰愛吾，宜矣。」段氏蓋用陶潛句「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之意。

②根據雪萊牛律同學霍格所著雪萊傳（Thomas Jefferson Hogg, "The Life of Percy Bysshe Shelley"）所述，雪萊的母親和四個妹妹都以美貌著稱。因此雪萊的面貌也姣好如少女。雪萊一八一一年一月十一日致霍格信中，如此形容自己的母親：「她是一個良善可敬的女子，從不會跟人過不去。」

③See Keats's Letter to Shelley on August 16, 1820. The quotation is from Spenser's "Faerie Queene" II. vii. 2 8: "With rich Metall Loaded every rifle."

④見崔羅尼之回憶錄Edward John Trelawny, "Recollections of the Last Days of Shelley and Byron" (in J.M. Dent & Sons, The Life of Shelley, Vol. II, pp. 180-181) 拜倫那句話是 "If he cast off the slough of his mystifying metaphysics, he would want no puffing."

⑤見「定庵全集」（台灣中華書局）補編卷三。

⑥見「經韻樓集」懷人館詞序。

⑦見「定庵全集」題辭。

⑧見「經韻樓集」與外孫襲自珍札。

⑨見朱傑勳「龔定庵研究」頁六七至六八。

⑩ "Yet Mr. Shelley, with all his faults, was a man of genius, and we lament that uncontrollable violence of temperament which gave it a forced and false direction." See William Hazlitt, "Shelley's Posthumous Poems," Edinburgh Review, July 1824.

⑪ 追溯雪萊身後聲名之升降榮辱，可看 Frederick A. Pottle, "The Case of Shelley" (1952)，此文收入 "Shelley: Modern Judgements", ed. R. B. Woodings (Aurora 1969)

⑫ Matthew Arnold, concluding paragraphs of "Byron" and "Shelley" in Essays in "Criticism, Second Series," pp. 143-4, 177.

⑬ T. S. Eliot, "Shelley and Keats" in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Cambridge, Mass., 1933) pp. 87-88.

⑭ F. R. Leavis, Revaluation (1936) pp. 204-207 乾脆說雪萊詩才不濟的，尚有另一位反浪漫而主理性的溫德爾斯。The bardic tone is common in Romantic poetry

: it sometimes occurs in talented (but confused) poets such as Blake and Yeats; more often it appears in poets of little or no talent, such as Shelley, Whitman, and Robinson Jeffers. (from Yvor Winters, "Forms of Discovery," 1967.)

⑮ 見註十一之同書同文。

⑯ 唐汝「魯迅全集補遺編後記」及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均謂魯迅亦頗受龔自珍影響。

⑰ 見朱傑勳「龔定庵研究」第一頁。

⑱ 朱傑勳在「龔定庵研究」中，先謂「溝通漢宋，不立門戶，是其長也。詩則宗仰吳梅村，陸放翁，詞則出入蘇東坡，辛棄疾，皆非其至也。」（頁八）繼又謂「龔定庵為一極偉大之抒情詩人。」（頁八八）

⑲ 龔自珍生於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陰曆七月五日，卒於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陰曆八月十二日，依中國算法，享年五十，依西法只得四十九。雪萊生於一七九二年八月四日，卒於一八三二年七月八日，尚不足三十歲。

⑳ See Joseph Raben, "Shelley as Translator", in "Shelley: Modern Judgements" (Aurora, 1969).

（本文小標題為編者附加）

龔自珍與雪萊 (一)



童年的雪萊，G. J. Stodart素描。

自然過於常人，尤以浪漫詩人為甚。雪萊從小

好學多思，時常獨坐一隅，神遊物外，被群童呼為「瘋雪萊」。他耽於鬼怪故事，喜歡說來嚇他的幾個妹妹。他對科學的興趣半在化學實驗，青煙繚繞之中，自稱是在召喚魔鬼。有一次在郵驛車上他和一位肥嫗對坐，竟生幻覺，認定她患了象皮症，傳染了給他，行將不治，惶惶自擾了很久。在「玄學思考」(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第五條釋夢裡，雪萊自述十八歲時在牛津郊外散步，在鄉徑轉彎處忽見一座風車，其後小丘迤邐，灰雲橫陳晚空，此情此景，頓悟夢中曾見。

龔自珍也同樣過敏。在「寒月吟」裡他自稱「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從小他患了一種怪病，聽不得門外賣糖小販吹簫的聲音，一聽，就發癡、怕冷。長大後對這種錫簫仍然過敏。「冬日小病寄家書作」便自述此事，以下只舉其前半：

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裡曾說：「滿心異想人非非，狂人戀人與詩人。」詩人的敏感

黃日半窗暖，人聲四面希。錫簫咽窮巷，沉沉止復吹。小時聞此聲，心神輒為癡。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夢猶呻寒，

投於母中懷。行年迨壯盛，此病恆相隨。

自珍有一篇叫「寫神思銘」的小品，裡面所述那種不可名狀的恍惚之情，與前舉的怪病似乎相通。茲僅錄其片段：

鄙人稟賦實沖，孕愁無竭，投閒適乏，沉沉不樂。抽毫而吟，其宣其緒，歛枕內聽，冥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蠶蛻？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妻孥而無疚。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

這麼微妙而神秘的奇愁，恐怕連善感的雪萊也把他莫奈何了。生於同年同月的中西兩大詩人，如果當日能相會而且對談，一定大有可聽。自珍受小學於段玉裁，習公羊春秋於劉逢祿，可謂儒家正統的傳人，但是他身為詩人，在飽受挫折之餘，也不免向釋道等更自由的世界去寄託他的想像。他自白道：「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①莊子或可比擬柏拉圖，屈原或

可比擬但丁，而柏拉圖的哲學與但丁的詩也正
深入雪萊的肝腸。

雪萊與西風

結伴而飛；

龔自珍夢回

清淚一潸然。



敏感的人常有夙慧，孩時的印象也分外深刻。
可是引領前瞻，一意要改革世界的雪萊，卻很
少回顧孩時②。在「西風歌」裡他有這樣的壯
語：

縱然我能夠

果真重回孩提的時代，

與你結伴去天上遨遊，

那時啊，要比你的高速更快

也不見得是妄想；

在「頌理想之美」(Hymn to Intellectual

Beauty)裡他又說：

小時候我追尋鬼魂，疾奔過

多少側耳的幽室、廢墟、岩洞，

和星夜的樹林，駭步追踪，

只望與亡魂能高談暢說。

可是少年的雄心經不起世途的坎坷，他在「
西風歌」裡如此悲呼：

我跌落荊棘的世途！我流血！

歲月的重擔已鏽住，已壓倒

你這個同伴，他不馴，迅疾，自傲。

「西風歌」寫於一八一九年，當時雪萊才二

十七歲，已經在慨嘆歲月的重擔。到一八二二
年，他又寫了這首極盡幻滅之美的「悲歌」：

啊世界！啊生命！哦時光！

我正拾級攀到你頂上，

回顧剛才的踏步而顫抖；

何時能再見盛年的光芒？

再也不能！——哦，再也不能夠！

無論是白晝或是清宵，

喜悅的心情早已遠逝；

早春，盛夏，殘冬的氣候，

只能夠帶來悲哀，而歡笑

再也不能——哦，再也不能夠！

龔自珍到中年以後也常發相似的感覺。在「

己亥雜詩」裡就有這麼幾首詩：

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

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

少年哀豔雜雄奇，暮氣頹唐不自知。

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瓊詩。

少年哀樂過於人，歌泣無端字字真。

既壯周旋難癡點，童心來復夢中身。

雪萊在「頌理想之美」中追尋亡魂，可謂「
哀豔」，在「西風歌」中與西風結伴而飛，可
謂「雄奇」。定庵既壯，染上虛偽與油滑，也
不復少年的天真了。「詩漸凡庸」與「頹唐不
自知」當然只是自我警惕，不是寫實。相比之
下，雪萊詩中的少年代表快樂、自由、天真、
敏銳；定庵詩中的少年所代表的卻以天真、敏
銳為主，至於所感所受，則哀樂俱深，因此歌
泣並作。定庵詩中屢言童心，比雪萊強說得多。
他寫「己亥雜詩」的時候，已經四十七歲，當
然易觸懷舊之情。但是早在他三十六歲時，「
夢中作四韻句」之二已有這種依戀：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凋。

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圍花影怒於潮。

前兩句的意思是：黃金無幾，花白的頭髮也
日稀；在這六九的衰世，所幸我的童心尚未消

混。在他三十二歲時又有一首詩，叫「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
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第一句愉悅迷惘的心境，有點像他自己「寫神思銘」的意味，十足表現了剛由夢境回到現實來而仍在意識邊緣的感覺。「瓶花帖妥爐香定」的靜境，是作者初醒時凝望久之的實物：他發現室內的一切跟他入夢前完全一樣。這種其可名狀的出神感，他小時候也曾有過（不然就是他剛才夢見了童年的事），一時之間竟似回到了廿六年前了。這首神品以瓶花爐香為界，可謂現實的座標，一面由主觀的空間，夢，回來，另一面則向客觀的時間，廿六年前，伸去。可是這一剎那，究竟是夢近而童年遠，還是夢即童年呢，卻已渾然難分了。這一切都必須依賴「瓶花帖妥爐香定」的實景，才能生效，否則就太遠離空幻，令人難以把握。想像的波濤要打在現實的岸上，才激起浪花。雪萊的詩喜歡凌空起落，而且喻中帶喻，有時令讀者莫知所從，就是缺少「瓶花帖妥爐香定」這種實物實景的支持。難怪李維斯說他「對實物的把握不足」(weak grasp of the actual)③。定庵這首詩探索到童年，但在另一首詩「猛憶」

裡，他卻透過童年伸進宇宙的童年：

狂飈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這首詩大意是說：中年的歲月都在羅列文獻、鑽研學術中消耗掉了，猛憶兒時悟性過人（或用心方式不同），一閃靈光一直通到世界初開，生命初起的原始。這簡直是超越文化，直通自然，達於宗教之境了。定庵少時在「壬癸之際胎觀」的一組文章裡探討過天道和人事的種種本質問題，正是詩末所謂的「混茫前」。其第四篇就說：「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悖，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燈，自然象徵智慧④，在定庵詩中是屢見的形象，而且在「寫神思銘」和「有情」一類文章裡也很動人。定庵常以禪入詩，此地「一燈」與維摩經的聯想自所不免⑤。



辭神不久，
入世未深——
中西詩人同樣珍惜
童年的純真與夙慧。

我認為龔自珍這麼心繫童年，在中國詩人裡，

實在罕見⑥。陸游的「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杜甫的「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寫童年情景都很動人，但是他們寫的都是常童⑦。杜甫詩中的孩子外傾好動，陸游的比較進入內心，卻都不像定庵詩中的這麼內傾而早熟。我初次讀到他這首「猛憶」時，真正嚇了一跳。要找一位英國詩人在這方面來頡頏定庵，恐怕雪萊還嫌不夠，得找華滋華斯。華滋華斯認為詩起於情，但詩情得之於沉靜從容的回味。此說近於「痛定思痛」。詩情不可太直接，太逼近，要經過回味的沉澱作用，才能由亂入定，求其精純。他的詩多來自回憶，尤多追憶童年，因為兒童最天真、快樂、敏感。他認為兒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的靈魂在出生前早已存在（Pre-existence），兒童敏於成人，正因為他們辭神不久，入世未深：他們「特異的心力」是入世漸深而漸弱的。基督教認為肉身雖朽，靈魂猶存，卻無靈魂先於肉體之說。柏拉圖則認為靈魂存在於生前與死後，它對於永久「理型」的知識，在出生時就全忘了，必須在有生之年靠哲學的修養才能逐漸追憶。華滋華斯的傑作「不朽頌：追憶童年所得之暗示」(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有如下一段：